彭德怀挥师西北鏖战“马家军”(二)

从我军角度来说，当时我军在西北地区的兵力满打满算野战部队只有7个旅，16178人，算上地方部队和后勤部队也不过两万余人，何况这些部队还不能全部拉到陕北，再加上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等后勤补给困难，敌我力量悬殊。但我军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很大提高，士气高涨，并且蒋介石置抗战结束后全国人民求和平、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美好家园于不顾，悍然发动内战，其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输了理，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却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真正为实现全国和平而战斗的，战争的正义性在我军这边。

因此，率领人民军队打赢这场军事和政治战争，便成为党赋予彭德怀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是对彭德怀的严峻考验。

二

利用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之间的矛盾，达到分而破之的目的，是彭德怀最为关心的问题。他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一个大胆的策略，即“吃胡看马”“先胡后马”：集中大部分兵力，先将老对手胡宗南部作为正面战场的主要目标，从多方面对骄横的胡宗南部实施致命性的打击，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青、宁“二马”，从而达到防止敌军联合，最终将其各个击破的战略计划。

遵循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在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的过程中，彭德怀井然有序地布置了阻击进犯之敌的作战计划。因此，在延安军民“石磨子”战术层层阻击之下，原先向蒋介石夸下海口三天攻占延安的胡宗南，直到战役发起后的一周，才以伤亡近万人的巨大代价，“攻取”了一座空城。

此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遵照中央方针，不断给进犯之敌予以有力打击。彭德怀集中西北野战军的主要力量，遵循围点打援、运动中消灭敌人等战术原则，短短数月间便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胜利，使胡宗南在西北的军事力量遭受惨重打击。

但就在彭德怀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部的同时，“马家军”却趁西北野战军无暇西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占去陇东地区的合水、西华池、曲子、环县、庆阳五个城市，陇东百姓遭到“马家军”的残酷掠夺和屠杀。“马家军”还借机大肆扩充武装。马步芳派韩起功到临夏等地大肆抓兵，新编129军；下令在青海农业区强征新兵1万名，在牧区征马1万匹，开赴陕北前线；在平凉、西峰镇强征新兵2.5万多人。一时间，整个大西北被“马家军”搞得乌烟瘴气，百姓苦不堪言，“马家军”实力却极速膨胀。

也就在此时，鉴于胡宗南部收缩集中，不易寻找战机的新情况，彭德怀也将西北战场上对敌作战的主要矛头指向恶贯满盈的青宁“二马”，他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西出陇东鞭抽“二马”的作战计划。194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几天来和彭、习商定了6月份作战计划。除警七团外，全军出陇东，歼击青宁二马”。很快，毛泽东便回电：“……此计划甚佳”。

出击陇东，彭德怀颇费了一番心思。此时的青马整编82师师部统辖下属第100旅分驻西峰、宁县；整骑8旅分驻庆阳、合水、西华池地区；骑兵2旅在悦乐、阜城。宁马整编81师的60旅在环县、蒋台，35旅则在羊圈山，整18师分驻三边。针对“马家军”分布情况，彭德怀制定了先打骑2旅和骑8旅，再打100旅的计划。

计划获批准后，西北野战军便在彭德怀率领下，兵分三路，自安塞西进。西野1纵为右路；新4旅为中路；2纵及教导旅为左路，显然左路部队任务最为艰巨，因为他们肩负的任务是围歼青马前突在合水的部队，并消灭可能增援的青马之100旅。对于此，彭德怀甚至想得更远，在5月28日向中共中央汇报部队动态的电报中，彭德怀、习仲勋曾联名报称：“（合水）得手后定会引起二马调动，再集中兵力作战”。

在彭德怀指挥下，西野部队迅速突破陕甘两省边界，到达陇东的怀安、悦乐、合水一线。右路和中路两部进展较为顺利，很快就拿下蒋台、悦乐，消灭宁马整编第81师60旅279团（欠一个营）和青马骑兵第2旅3团的五个连队，俘获马鸿逵的女婿上校团长马奠邦，以及少将副旅长陈应全，但左路2纵及教导旅却碰到硬钉子，仗打得极为惨烈。

当时，西野之左路军以王震指挥的第2纵队为主力，翻越子午岭后，5月28日即接近合水。2纵遂决定以359旅攻击合水，独4旅与教导旅打援。然教导旅前卫团刚到达合水以东20多里的罗儿塬蒿草铺，便与青马整编骑兵第8旅警戒部队遭遇，双方立即展开异常惨烈的战斗，我军损失较大。

凌晨四点，在旅长郭鹏部署下，359旅第717团开始向合水西北展开进攻，718团和独4旅第12团向合水东进攻，719团作为攻城部队的预备队。29日中午，359旅718团和独4旅12团先后占领合水东部和南部诸高地，下午，718团杀入合水东关，守军退入城垣负隅顽抗。但717团却打得很不顺利，甚至预备队719团投入战斗后亦无法改变战局。当时我军按以往的作战方法，凭刺刀手榴弹逼近敌人的外濠前沿，但狡猾的“马家军”却早有埋伏，待我军攻击部队端着刺刀冲至近前时，预伏在暗道里的敌人突然出其不意地杀出来，我军指战员立足未稳，而“马家军”却个个精熟刀法，就这样，717团和719团不久便因伤亡过大撤出了战场。

由于对合水的城池布防掌握不够，西野的突击没能取得预期效果，而我军围攻合水的意图却暴露无遗，双方在合水周围形成对峙局面。这时，驻守庆阳的“马家军”整编骑兵第8旅一个团，仗着骑兵的机动速度和精良的装备，高举战刀，气势汹汹，直奔合水而来，企图解合水之围。

负责警戒的教导旅仓促应战，损失不小，王震急令独4旅出其不意地从马莲河一线悄悄插到这股敌人身后，断其退路，以给其造成心理上的压力。果然，这支“马家军”骑兵部队闻听后路被断，便不约而同地拨转马头，夺路而逃。这时，我军战士一看敌军要逃，便不顾一切地猛扑上去，死死地抱住马头或揪住马尾巴，还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殊不知，这些马上屠夫杀人手段之残忍，他们毫不犹豫地手起刀落。我军又伤亡一部。 （未完待续）

（据银川党史网）

蒿店兵变：诞生宁夏第一支红军部队

青砖墙古朴厚重，默默见证着历史沧桑。城墙门洞上“蒿店镇”三个大字，历经近百年风雨侵蚀依然清晰可辨，见证着蒿店兵变那段历史。

蒿店兵变旧址位于泾源县六盘山镇蒿店村，地处西安至兰州公路上的交通要道，南北两侧都是高山峻岭，行军作战便于隐蔽，易守难攻，沿山向东经彭阳可直通陕北。

上世纪30年代初，曾在这里发生了由中共陕西省委策划组织领导的固原第一次有影响的武装暴动，史称“蒿店兵变”。这次兵变，创建了宁夏第一支红军部队，打响了宁夏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

1932年4月，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最疯狂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贯彻《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精神，积极扩大军事力量，继组织发动“靖远兵变”之后，决定由陕西省政府政治观察员陈云樵潜入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邓宝珊部搞兵运工作。

邓宝珊派陈云樵到“行署干部补习队”的军官队担任区队长。“行署干部补习队”下设军官、士兵2个队。军官队学员多为邓宝珊旧部、冯玉祥的部下和阎锡山介绍来的部分人员，成分极为复杂。士兵队学员多为招考进来的，主要培养班排长一级军事骨干，成分较为单纯。

其中，任士兵队队长的李华峰和下属2个区队长、9个班长全部是共产党员，可以说士兵队基本掌握在党组织手里。

陈云樵到达兰州后，首先和甘肃特委负责军事工作的孙作宾进行组织联系。按照党组织在士兵队开展活动的决定，陈云樵和李华峰经常研究形势，教育党员，争取学员，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使党的地下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起来。

1932年9月，蒋介石为笼络邓宝珊，调拨给其德国造步枪800支、驳壳枪200支，以及一批弹药，决定于9月中旬经甘肃平凉运抵兰州。

为把这批武器弹药从西安经西兰公路安全运到兰州，邓宝珊派行署干部补习队260多名官兵到平凉接运。

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得知后，立即报告了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夺取这批武器弹药，扩大补给刘志丹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遂派省委常委兼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带周志学到平凉开展具体工作。在平凉，李艮与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刘杰三和李华峰，以及时任补习队军官队区队长的陈云樵（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接头联系，共同研究夺取武器方案。

李艮、李华峰等具体分析敌我情况后，认为前来平凉接运枪支弹药的行署干部补习队官兵里，中共地下党组织控制了一半，士兵队的130多人全部掌控在李华峰手中，决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分析认为，平凉是国民党陇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又是西兰公路必经的交通要道，在这里组织兵变危险性很大，决定避敌重兵，将兵变地点选择在距离平凉西北35公里，即出平凉到兰州的第一个驿站——六盘山下蒿店镇。李艮任兵变的总指挥，刘杰三留守平凉策应。

1932年9月18日，干部补习队从平凉接到枪支弹药，沿西兰公路返回，至平凉西北的蒿店镇宿营。当晚，士兵队住在镇西街，干部补习队队长楚则先、教育主任姚亮和军官队住在街东头。

根据当晚宿营情况，李艮、周志学、李华峰、陈云樵等立即秘密召开会议，决定抓住有利地形和战机，在晚11时部队全部休息后开始行动。并对兵变进行具体部署，要求全体兵变官兵一定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明确各自任务后，陈云樵回到驻地，把晚间岗哨撤进所住院子里，叮咛站岗的哨兵关好院门，在院中听候信号。他又到班里要了一支冲锋枪带在身上，随时等待行动。李华峰带着士兵队全部压好子弹，和衣佯睡，等待行动命令。

暴动计划被补习队队长楚则先所察觉，并命令加强了岗哨，还将自己的住所从蒿店街道的东头军官队搬至西头的士兵队。加之兵变前，个别投机分子临阵退缩，携抢出逃，给原本就紧张的士兵队员思想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等待按预定时间行动时，蒿店河里传来狗吠声，哨兵误以为被敌发觉，遂向李华峰报告。李艮、李华峰派人查看，发现敌人竟然增加了岗哨，楚则先也转移了住处。鉴于情况突变，为了保存力量，随即决定提前行动，与陈云樵失去联系。

兵变后，蒿店镇笼罩在白色恐怖中。陈云樵依然坚守敌营当卧底，遭到敌人怀疑后被送到兰州审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周旋下，陈云樵历尽艰险被营救出狱，于1933年3月返回中共陕西省委。

（据宁夏党史微信公众号）

革命夫妻夏麟阁与陈凤兰(下)

夏麟阁还积极对何晓霆进行争取工作，成功说服何晓霆向解放军投诚。何晓霆是山东寿光人，一直在马鸿逵部任职，但马鸿逵用人任人唯亲，因此一直受到排挤。直到解放初期，才被提拔为一二八军的副军长，处于有名无权的尴尬境地。对于这样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果采取的方法得当，是能够争取其起义投诚的。因此，中共宁夏工委书记赵国忠多次指示夏麟阁要做好何晓霆等人的工作，争取其向人民靠拢，为解放灵武做准备。1947年后，解放战争的形势进一步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军队在各条战线上纷纷败退，马鸿逵只能困守宁夏，坐以待毙。这种情况下，夏麟阁寻求机会，设法争取让何晓霆率部起义。夏麟阁以各种方式与何晓霆接触，多次秘密商谈，制定起义的具体措施，同时收集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1949年8月宁夏解放前夕，何晓霆派人将河东地区驻防阵地图、电报密码等送到吴忠南面滚泉的解放军十九军团六十四军阵地。夏麟阁奔走在灵武军政界上层人物之间，特别是对时任灵武县长的张国维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解解放军进军西北的形势，促使张国维等人对当时形势有了清晰的认识，对灵武的和平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解放后，夏麟阁积极参加灵武的革命工作，先后担任灵武县政协委员、宁夏省政府参事。由于夏麟阁在解放灵武时作出的重要贡献，每当灵武县政府举办一些重要会议，都会邀请他参加讲话，并提出意见。无论是县领导还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尊敬他，称他是灵武解放的头等功臣。1951年，夏麟阁年事已高，光荣退休。1980年11月15日，夏麟阁病逝。

陈凤兰在解放后也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先后任灵武一区区长、城关公社书记、县民政局局长、县妇联主任等职。20世纪50年代，她带领群众平整土地，植树造林，发动群众抗美援朝。特别是1958年，她任城关书记时，曾率领1000多名社员，连续8个月奋战在西大沟，吃住都在工地，被誉为“女强人”。1951年，陈凤兰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2年，她参加宁夏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1953年，她参加西北行政区劳动模范大会。长期的艰苦工作使陈凤兰积劳成疾，于1962年8月30日病故。她去世后灵武县委和政府在灵武西操场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 （据银川党史网）

移民岁月 第七十三期 YI MIN SUI YUE

支援宁夏 无怨无悔(二)

——宁夏卫生学校上海支宁教师马洪达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马洪达（第二排中）在宁夏卫校学习时留影。

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已经是个国际都市，外语人才就业机会更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马洪达重新走进学校开始读书，这次他报的是剑桥英语学校。剑桥英语学校对学生特别严格，要住校，英语环境也特别好，在这所学校的学习为马洪达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以至70年后还能熟练地读写英文，上世纪80年代评职称要英语考试，马洪达英语考试成绩98分，是当年参考人员中最高成绩。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报名参加志愿军在上海成为最大的浪潮，马洪达满怀保家卫国的激情和镇上的另一青年一起报了名，后因体检不合格失去参军机会。1953年，上海又掀起西部建设热潮，许多西部省区都在上海设招人办事处，到边疆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青年人追求理想的最佳表达方式，马洪达也加入到这股支援边疆建设的潮流中。当时的宁夏省也在上海设了办事处，负责招人的就是上海人张韻舫，她受宁夏省卫生署负责人张程委托，到上海招兵买马，招人的标准一是志愿，二是有知识有文化。马洪达在报名时即被选中，那年他刚刚25岁，离开上海时他心爱的女儿只有6岁，夫人对他的举动除了口头支持外，更多的是行动上的支持。

马洪达：招我们来宁夏的张韻舫讲得很客观，把西部生活艰苦、条件差都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但我们那时候有股激情，想着投身到祖国的大西北建设中，要用自己的创造力为改变西部的贫穷和落后贡献自己的力量，没有一点犹豫，家里人听说我报名支援大西北，也没阻止，都是很支持的，说真话，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个宁夏省，只知道西安。我们是1953年3月4日从上海出发，3月5日到西安，当天就听到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当时中苏关系处在“蜜月”期，我们这些上海的支边青年还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斯大林逝世纪念大会”，在热泪盈眶中高呼：“到边疆去，建设大西北，誓把青春献给祖国，把大西北建成人间天堂”。追悼大会后又把我们集中组织在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最后把我们15个人分配到宁夏，其他人有的去了新疆、有的去了青海或甘肃。在学习期间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点钱。3月14日早晨，我们集体搭乘一辆军用大卡车，向银川出发，3月17日到。车上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过平凉，一路荒野、黄沙漫天，吃的饭里也有沙子，真的是给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上海的青年人一个下马威。出发的时候大家还欢歌笑语，谈论的是如何到边疆作贡献，还有人开玩笑说要娶个西北的妻子，但一过秦岭，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让大家惊呆了，歌声变成了沉默，再往西就有了哭声，开始是个别女青年偷偷抹眼泪，后来是一起号啕大哭，连比较坚强的男青年也开始哭了。西安出发时安排我当队长，一路还要安慰他们，真的好累好累，就这样还有几个半路下车跑掉了。到了银川安排到宁夏省卫生署报到，安排了两个房间，睡的大土炕，这个也是从来没见过的，所以我讲，我们到宁夏是从睡土炕开始的。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

三位军垦知青的支宁故事(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郭淑珍（右二）在工作间隙留影。

郭淑珍不论是一个农工，还是一个拖拉机手，还是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还是一个团场领导，她都表现出劳动者吃苦耐劳，工作兢兢业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品格。她工作作风稳健，处理问题稳妥，一针见血，工作作风泼辣，深受团场领导的赏识和职工群众的拥戴。

1979年知青返潮的声浪很高，那时她是团场知青工作组副组长，郭淑珍夫妻的思想也有过激烈斗争，早在两年前就有一块偌大的石头压在她的心头，她只有回家默默地流泪，为远方的父母和姊妹祈祷。两年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她的两个妹妹都相继不幸因病去世，给父母家庭欠了一大笔债，家庭陷入困境。远在北京的父母没人照顾和赡养，父母又多次哀求她说，看在父母年老体弱的份上，趁知青返城时机，舍弃宁夏的感情和一切吧。

看着父母一封封滴满泪痕的来信，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郭淑珍动心了，养育之情和儿女之情在她的心中升起。

在矛盾纠结的情况下，他们也听到了农场职工们的议论：这两口子真不知足，场里对他们这样好，他们还要走，以怨报德，人心不足。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郭淑珍夫妇才给农场党委汇报了他们的家庭情况和思想斗争过程。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农垦局领导了解她的家事以后，也格外关心，最后告诉她，如果北京方面有接收单位，我们宁夏方无条件大开绿灯，不行你们就回来，农场的大门向你们打开。

最后，北京城市建设通风公司同意接收郭淑珍同志，但提出以干部身份调入手续繁杂，困难繁多，以工人身份调入比较容易，最后郭淑珍以工人身份调入北京市通风公司，从事工人岗位。通过几年的工作，公司看到了她的工作能力，把她调整到公司人事部门。

她回京后就住在妈妈家里。

1995年春节前夕，郭淑珍因病住院，几天的治疗后，大夫说，身体基本康复，明天就可以出院。第二天一大早，医院开出了出院证明，因为身体无恙，家人当时也没有陪护，郭淑珍早上起床去上厕所，倒在了厕所里，醒来以后自己又走回病房，倒在病床上后，就再也没有醒来，大夫诊断说，疑似“肺栓塞”。郭淑珍就这样不幸去世，时间是1995年1月27日，终年47岁。

郭淑珍是北京知青在宁夏大地上的优秀代表，她是较早来到宁夏军垦大地上的一朵艳丽的鲜花，她是根植于宁夏军垦大地上的一棵鲜艳的沙枣树，从种子发芽、到幼苗茁壮成长，再到开花结果，是宁夏军垦肥沃的土地培育和养育了她，她的身上有滋养她的宁夏养分，有她割舍不了的知青情结，在北京她还念念不忘暖泉的沙海绿洲。

这样一位优秀的知青，在青春还在勃发的中年，就不幸凋零，英年早逝，让宁夏的军垦农垦人痛惜不已、唏嘘不已。

（祖宁平 马晓虎 整理）